

哈代与贾平凹的乡土叙事和伦理选择

The Local Narration and Ethical Choice of Thomas Hardy and Jia Pingwa

朱振武 (Zhu Zhenwu) 杨芷江 (Yang Zhijiang)

内容摘要: 作为乡土叙事的高手,英国现代作家托马斯·哈代与中国当代作家贾平凹都聚焦社会变革时期乡村的伦理冲突,并在各自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和《秦腔》中对伦理选择问题进行了深层思考。虽然处在不同时期,两个作家在主题的呈现方法、故事的推进手段,特别是对乡土问题的认知等方面具有颇多相似之处,其文本在接收端的美学效果也比较一致,体现出不同时期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文学家们情理相通之处,也证明了文明互鉴所需的文学基础的存在。

关键词: 哈代; 贾平凹; 乡土叙事; 伦理选择; 伦理身份; 伦理冲突

作者简介: 朱振武,博士,二级教授,博导,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负责人,主要研究方向为英语文学文化、中外文学文化关系和翻译学;杨芷江,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研究生,主要研究非洲英语文学与文化。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洲英语文学史”【项目批号:19ZDA296】的阶段性成果。

Title: The Local Narration and Ethical Choice of Thomas Hardy and Jia Pingwa

Abstract: As masters of local narration, both Thomas Hardy, a modern British writer, and Jia Pingwa, a contemporary Chinese writer, focus on the ethical conflicts in the countryside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 changes, and made deep reflections on the issue of ethical choice in their respective masterpieces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and *Shanxi Opera*. Although the two writers are in different time periods, they have many similarities in the presentation of themes, the means of promoting stories, especially the cognition of local issues. The aesthetic effect of their texts at the receiving end is also relatively consistent. These phenomena not only reflect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writers and writers under different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in different epochs, but also prove the existence of the literary basis needed for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s.

Keywords: Hardy; Jia Pingwa; local narration; ethical choice; ethical identity; ethical conflict

Authors: **Zhu Zhenwu**, Ph. D., Senior Professor, Head of National Key Subject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of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12, China). His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English culture and literature, literary and cultural relations and translology (Email: fredzzw2002@163.com). **Yang Zhijiang**, a graduate student major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i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1612,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African English literature and culture (Email: lareinayzj1998@163.com).

引言

土地是活着的时间，承载个体的生长，见证时代的剧变。社会转型时期经济与文化的狂飙带来历史与传统的失重，乡土文明被逐渐边缘化。新的伦理环境下，尖锐的伦理矛盾亦应运而生。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文学见证时间并试图揭示人的价值与意义。“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¹，文学作品体现人的价值取向与伦理要求，这也是文本得以具有教育、教诲作用的原因。19世纪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以他的故乡多塞特郡（Dorset）为蓝本，虚构了“威塞克斯”（Wessex）这片土地，并通过其代表作《德伯家的苔丝》（*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1920，以下简称《苔丝》）等一系列作品集中展示了维多利亚时期资本主义工业迅猛发展下乡村生活所经受的冲击，批判了人性的堕落与虚伪。《苔丝》问世百年后，中国同样面临城市化转型的挑战。寻根文学代表作家贾平凹也同样洞察传统文化的艰难生存环境，挖掘民族文化心理，记录被忘却的乡土生活。他的出发点是依赖、寻求和拯救传统精神文化支柱。简而言之是想“寻中国文化之根”。²两位乡土叙事的大家不约而同地关注到乡土伦理环境下衍生的伦理困境，通过对传统意识的反思、对文化心理的挖掘和对人物伦理选择的刻画，向读者揭示了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也侧面传达了作者的伦理取向。小说人物从不同的伦理困境出发，做出了各自的伦理选择，充分显示出小说作为人类成熟艺术的共通性和互鉴功能。

一、传统与现代冲突中的伦理选择

乡土是社会的根基，乡土伦理从人与土地的相守相恤中诞生，并与道德秩序、生活原则共生依存。城市化浪潮将传统与现代的尖锐冲突逐渐从幕后推向台前，农村与城市的对立直观描绘出伦理环境的剧变，这是诞生文学的重要历史条件。伦理环境的架构使人物拥有具体历史坐标，并随着人与人、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而更新。人物的伦理选择受制于变化的伦理环境，却也

1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价值选择与理论建构”，《中国社会科学》10（2020）：82。

2 参见 许子东：“寻根文学中的贾平凹和阿城”，《文艺争鸣》11（2014）：14。

彰显着人对伦理矛盾的思考，充分展示着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的博弈。

哈代自幼成长在古朴恬静、远离尘嚣的田园环境中，大自然温柔的抚慰使哈代记忆和血液里都充满对乡土伦理的崇敬。他对“埃格顿荒原”意象情有独钟，“茫茫的艾格登荒原的东支就近在咫尺，土地的每一起伏便都保持了史前时代的形象，每一条沟渠道路都还是不列颠人时代踏出来的，原封未动”（411）¹。广袤无垠和荒无人烟的原野代表了自然的初始状态，死亡与新生在荒原上轮回。这片土地是乡土文明的摇篮，象征乡村伦理环境最真实的状态。

然而，先进的工业生产方式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乡村。社会变革没收了农民赖以生存的工具，也重创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失业危机、阶级矛盾、生活困苦，这片土地的原居民正经历着未曾有过的苦难。19世纪末这个复杂而不稳定的时代让人们滋生了提高身份的念头，却又无从实现。这就是时代动荡不安的罪孽之一。²乡村人民的品行也被无声地侵蚀着。《苔丝》中的主人公苔丝（Tess）的悲惨遭遇直接来自亚雷（Alec）的诱骗和克莱尔（Clare）的虚伪。前者是道德败坏为所欲为的“邪恶”，后者是冠冕堂皇虚伪懦弱的“丑陋”；前者让苔丝失去了宝贵的贞洁，后者则让她失去了生活的信念。“人性是在特定的伦理环境中形成的，是在道德教诲中完善的。伦理环境发生变化，人性也会因伦理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改变”³。资本主义金钱观和权力观侵蚀着亚雷和当地人的道德底线，卑鄙的言行逐渐获得认可和效仿，高尚的品格在每况愈下的民风下凋零。传统正在被影响和改造，如苔丝这般真挚善良的女子饱尝痛苦，笼罩在“失贞”的舆论漩涡下难以脱身，最终成为可悲的牺牲品。作为伦理环境中的主体之一，亚雷的伦理选择体现了自我意识，他的选择背离了乡土伦理的叙事范畴，是对资本主义扩张的伦理环境的外显。苔丝是天然纯洁的自然之女，在自然的哺育下成长，时刻未曾远离乡土。如同每一位传统的威塞克斯人一样，苔丝热爱自然，诚实隐忍，追随着威塞克斯的古老传统。作者选择苔丝作为英国前工业时代南部农村整个农民阶级命运的范例，是有着深刻的思考的。苔丝是贫穷农民的后代，拥有古老而脆弱的家族历史背景，其个性与精神被完全打上地域的烙印。面对新文化的冲击，苔丝无法克服思想的限制，无法抵抗新环境的打击，无法凭借一己之力对抗资本主义的压迫，也无力改变迂腐但顽强的传统道德体系。苔丝前期的顺从与所遭受的苦难是乡村伦理体系的产物，其伦理选择显然还是以传统乡土伦理为恒定导向。苔丝的屈服象征着乡村文明在强势的城市文明前的虚弱无力，也暗示着旧生活、旧生产方式和旧伦理思想方式不可避免的失败。

1 本文有关《苔丝》的引文均来自哈代：《苔丝》，孙法理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以下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详注。

2 参见 James Gordin, *Harvest of a Quiet Ey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1.

3 参见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概念的阐释与考辨”，《外国文学研究》6（2015）：17。

无独有偶，这种对立在《秦腔》中也十分明显。清风街的盛衰荣辱和秦腔的起起伏伏都是对远去的乡土文明的凭吊和现代文明的试探。全球化和现代化浪潮的冲击模糊了城市与乡村的边界，农民身份的解构和土地重要性的消失瓦解了乡土文化的传统。农民何去何从，未来堪忧，是继续坚守在土地上还是追随大流进城打工？这是20世纪80年代时代背景下新的伦理选择困境。作品中的夏天义是传统的坚守者。作为清风街的老主任，他一心为民，毫无私心，具有典型的乡村淳朴正直的品德，即便是儿子盖房子多占了一些宅基地，也喝令推倒重来，夏天义对土地十分执着，认为农民一辈子就应当老老实实地待在土地上耕种。“‘你以为省城里是天堂呀，钱就在地上拾呢？是农民就好好地在地里种庄稼，都往城里跑，这下看还跑不跑了’”

（391）¹。为了防止村里人抛弃农民的本行去打工，他反对修建公路，但随着农村与城市的接轨，还是真切地感受到农村生活正离他远去，所能做的只能是继续待在七里沟淤地。没有人愿意追随他朴素理想，最终他身边只剩下疯子引生和哑巴。夏天义这个乡村的老人最后对乡土伦理的坚守只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反抗，这种坚守只能是对日益解体的乡村生活的缅怀和纪念。

与作品中的夏天义一样，土地滋养了贾平凹，为他提供了感知生活的途径。来自乡土但又得益于城市生活的滋养的贾平凹把乡土文化的困境、城乡文化的冲突和新旧思想的差异糅合在对清风街的描写中，向读者娓娓道来。小说中的清风街是贾平凹儿时住过的棣花街，更是无数读者记忆里千万条无名的老街。贾平凹和读者一起重构乡土形象，因而其笔下人物的伦理选择和言行举止就更具代表性。作者在后记中回忆起故乡时说，农民“无法再守住土地，他们一步一步从土地上出走，虽然他们是土命，把树和草拔起来又抖净了根须上的土栽在哪儿都是难活”（424）。夏天义所做的伦理选择在现代人眼中实属冥顽不化和墨守成规，但是他的确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去了守护一辈子的信念与目标。被推倒的不仅是土墙，被填没的不仅是土地，而是编织老一辈农民生命中所有时间点的经历，这些经历不会重现，甚至正在被遗忘。这群老人是一群流离失所的人，在传统与现代中无家可归，在自己的乡土流浪，靠坚守和回忆来与所剩无几的土地建立联系。

乡土伦理是横亘在非自然力量扩张前的一道防线，以根深蒂固的习惯与难以忘怀的回忆来唤醒人们对乡土的记忆。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发掘不同时代、不同类型文学中的伦理价值、自然和谐的人伦理想，对盲目自信的人类来说是具有警示意义的。²面对人伦理想而做的伦理选择，其出发点除了对优美自然风光的怀恋，更有人对稳定的生活方式、宽厚的生存氛围以及神秘的心灵反馈的追求，并以此来对抗冰冷贪婪的机械文明。《苔丝》和

1 本文有关《秦腔》的引文均来自 贾平凹：《平凹四书：秦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以下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详注。

2 参见 李定清：“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人文精神建构”，《外国文学研究》1（2006）：48。

《秦腔》这两部小说中的人物的伦理选择都无可厚非，因为作为某一环境坐标下的主体，其不同的伦理选择更能够凸显不同个性的人与乡土即伦理环境的距离。尽管都面对不可逆转的时代大潮，但凭借作品中人物的伦理选择，两位作者向读者全方位地展示了各自所处时代的乡土存在的重重困境。

二、模糊的理性与伦理选择

作为理性叙事的对立面，哈代和贾平凹的非理性叙事是故事中的人物面临的伦理困境，更是两位作家作为局外人对文化背景中的伦理困境发出的疑问。《苔丝》中的民俗传说和《秦腔》中的神秘预言都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作者的创作缘由与价值取向。作品中的非理性叙事为故事增添悬念的同时，也往往暗示着迷失的自我与消失的理性，作品中的人物走向了自我命运的深渊，其伦理选择是偶然也是必然。

民俗是一个民族发展历史中约定俗成的行为和观念，往往带有迷信色彩。尽管许多民俗的来源已不可考，但是人们对神秘自然力的崇拜使之得以口口相传，而文学的出现使得民俗和传说得以更好保存和传承。

在新的情境下许多东西显然不是起源，它们只是延续了下去。在处理这些遗留物（survivals）材料时，历史首先直接地告诉我们，旧习惯是如何在新文化中站稳脚跟的，它不会引进新文化，相反会努力把它们赶走。¹神话、民俗与仪式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体现，这种遗留物阐释过去，预兆未来。“关于未受教化的乡村大众是文化遗迹的档案”的概念可能在哈代重构威塞克斯乡村生活的想象中产生了深厚的影响。²哈代熟知当地的民俗传说，其创作也显然受到民俗传说的影响。威塞克斯地区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公元六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时期，甚至最早能够到古凯尔特人时期公元1世纪以前。³可见，哈代这部小说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神秘古老的故事背景里，人物的伦理选择除了受到自我意识的影响外，更在潜意识中受到非理性的集体无意识的操控。威塞克斯的伦理环境很古老，人们遵循着先人的遗嘱与神话传说，笃信与崇拜着自然的能量与传统规范的约束，因而在面对伦理困境做出伦理选择时，现代社会的理性反而被排除在外。

小说中哈代借一首古老民谣点明了苔丝的伦理困境。婚前，苔丝试穿婚服时，独自在镜子面前端详衣服的效果，“此时她妈妈那首有关丝质长袍的民谣忽然在她的头脑里想起——曾经失节的妻子，穿上它决不会称身”（226），这首《儿童与披风》是英格兰地区的民间歌谣，在民间广为流传。结尾写道“亚瑟王怒喝，你确不贞节！”苔丝在这一特定的场合想起这首民

1 参见 Edward Burnett Tylor,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Language, Art, and Custom*, London: John Murray, 1871.

2 参见 Andrew Radford, *Thomas Hardy and the Survivals of Time*, Aldershot: Ashgate, 2003.

3 参见 吴为娜：“论哈代小说的乡土色彩和民俗因素”，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4页。

谣是她内心无意识的伦理困境的体现。苔丝此刻作为克莱尔的未婚妻，想坚守这一伦理身份，但又深知自己早已失贞，因此深陷因贞洁观和道德观所带来的恐惧之中。婚礼结束后，两个新人正要离开时，怪事再次发生：一只公鸡突然啼鸣。“不吉利。（……）偏偏今天这么乱叫！这一年来还从来没听见它下午打过鸣呢”（236）。公鸡下午打鸣被视为不祥的预兆，果然不久后，克莱尔与苔丝的婚姻便破灭了。民俗禁忌多具有非理性特点，而哈代却用神秘恐怖的自然景观来烘托氛围，使悲剧情节更易展开。“这儿是当年猎人追逐麋鹿的地方，是巫覡受到针刺与沉水的检验的地方，也是满身绿斑的妖精跟行人恶作剧的地方，当地的人仍然相信这一切的存在，说那儿的妖精成堆”（377）。阴森可怖的森林仿佛无尽的深渊，而苔丝需要从这片神秘的森林里穿过。读者未必能够预感到苔丝立即将遭遇厄运，但是也能预见到这片森林的不详。如果说苔丝由婚服联想到民谣与失贞是小说人物的伦理身份所面临的困境，那么这种有意或无意打下的伏笔，可以正凸显了作者作为创作主体的伦理选择。

尽管哈代此刻尚未显出对现代性的反思，但是通过苔丝命运的走向，我们可以窥见哈代的悲悯之心。在女性失贞即为原罪的威塞克斯社会中，古板僵硬的道德观念禁锢住女性本该自由伸展的命运之树，而苔丝只是千千万万中的一个。被凌辱的苔丝即便努力尝试重新生活，其希望也终究被无情扼杀。苔丝在做出选择时有过努力，但是面对吃人的律法和残忍的刽子手，其伦理选择只能指向悲剧。在处理苔丝违背法律的实罪与被逼无奈的反抗间，哈代经受着内心的伦理斗争。作品中的苔丝仿佛被无形的手推动着走向刑场，其命运与其道德无关，这恰恰是违背文化伦理与人性特点的地方。哈代给予苔丝的一生包含着他对乡土文化传统的反思和对女性悲剧命运成因的探究，而苔丝在非理性伦理环境中的解脱正是哈代自身意志与伦理选择的结果，作者让苔丝用鲜血与生命重新换得对自我的救赎。

贾平凹在这一点上与哈代颇多相似之处，当然，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式曾给予贾平凹丰沛的灵感。“我从小生活在山区，山区一般装神弄鬼事情多，不可知的事情多。这对我从小时起，印象特别多，特别深”（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十四卷》365）。贾平凹出生于陕南商洛，深受当地的禁忌仪式、神鬼巫术等元素的影响。他巧妙地在《秦腔》中运用了故土特有的民俗传说与神秘意象，荣叔神神叨叨的预言，清风街村民的通灵，一场离奇诡异的暴雨，等等。小说的叙述者引生是个疯子，举止疯疯癫癫，言行不同寻常，可以和动植物对话。他的形象表面上只体现兽性因子（animal factor），与理性的现代人毫不相关，而实际潜藏在深处的人性因子（human factor）则赋予他超凡的灵性。他拥有坚定而质朴的伦理观念，是一位聪慧淳朴的天真之人。借引生的视角，贾平凹书写了清风街上的人间百态，出轨、通奸、权钱交易之事都在走马灯般上演。然而不染尘俗的心灵与稳定正统的伦理观始终使他跟随天

然本能与自身情感的引导，游离于肮脏的世俗之外。引生的伦理选择是稳定而善良的，他无法理解在金钱、利益侵蚀下发生剧变的农村生活，于是成为兼具非理性与理性的矛盾体，成为清风街上最坚定的伦理选择的执行者与伦理道德的坚守者。

引生对世界的观察带有深入自然的神秘主义色彩，他认为自己是一只蜘蛛，“蜘蛛蜘蛛你替我到会场上听听他们提没提到还我爹补助费的事”

（228），于是蜘蛛就往上爬动了。预兆式的非理性叙述增强了这片乡土的神秘底色。引生爱恋白雪，与白雪的几次碰面都伴随牡丹花的出现。牡丹花因此成为引生心里白雪的缩影。白雪的女儿恰好也叫牡丹，她生来就没有肛门，这使读者联想到《百年孤独》中那个长着猪尾巴的孩子。作者带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书写，通过非理性的巧合向读者暗示了牡丹、夏家、清风街乃至整个乡村不甚明朗的未来。小说以群像式的情节展现了清风街人们的命运景观。走还是留？高洁还是卑鄙？精神还是物质？这些都是人物面临的伦理选择。

哈代和贾平凹对故土的命运感到痛惜，他们选取非理性的传说、预兆并辅以魔幻手法的叙述，极大地增强了小说中的命运冲突与伦理冲突，为消解的故土覆上极具命运感与神秘感的面纱，恰如他们目睹一切而无能为力的悲伤的叹息。以苔丝、引生为代表的角色都是文化伦理遭到挑战之下的命运个体，质问着伦理的失衡，消解着自己的身份，以自身的伦理选择抗衡着消失的理性，以此来完成自己的伦理命运。作品带给我们的伦理启示和社会意义是深刻的。

三、音乐的消失与伦理选择

音乐是一种重要的叙述形式，在音乐的轻重缓急里，情感的波澜起伏变得具象化，“音乐比别的艺术更易于表现漂浮不定的思想”（丹纳 94）。

《苔丝》和《秦腔》这两部小说中均出现声音与音乐，无论是自然之音还是秦腔之音，跳动的音符展现着作品主人公内心的生命冲动，传达着作者隐形的感情与观点。

音乐性是哈代大多数小说中一个突出的特征。¹在《苔丝》中，哈代加入了许多民歌民谣，如《看东方，才破晓呀》《儿童与披风》等，并频繁地使用声音的描写，或清灵动听或沉重哀伤，给读者以多角度、多感官的体验。除此之外，主人公苔丝本身就与自然的音乐融为一体。在哈代看来，“理想的人，就是亲近自然的人”（丁世忠 213）。这个妙龄女郎如同轻巧的音符在自然的乐曲中起舞：“苔丝既想不到时间，也想不到空间了。她全身随着旧竖琴的细弱的曲调荡漾起伏，和谐的旋律像清风一般沁入她的心田”

1 参见 C. M. Jackson Houlston, “Thomas Hardy’s Use of Traditional Song,”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44 (1989): 301.

(145)。无论心理还是精神，情感还是道德，它们都存在于具体的伦理选择活动中，并且同某种伦理身份联系在一起。¹苔丝聆听着克莱尔的乐声，在音乐里找到了与灵魂相通的共鸣。此时视觉、嗅觉、听觉融合在一起，互相应和，达到了超然升腾的意境；自然与爱包围下的苔丝拥有着她最为本真与幸福的伦理身份，她的伦理选择与自然相契合，她在乐声中与自然融为一体。随着悲剧的展开，小说中的声音逐渐变得紧张低沉，以至于最后伴随着钟声消失在一面猎猎作响的黑色旗帜里。音乐不再重鸣，美丽善良纯洁的苔丝也不再出现。

哈代始终彷徨在自然与现代技术的矛盾里，用小说中的声音提醒着内心的摇摆，“她呼吸的每一起伏，血流的每一涨落，耳里震响的每一声脉跳都跟她本性的要求唱着同一个调子，都是对于她的谨慎畏惧的一种反叛”

(196)。苔丝追随自己内心的声音，无所畏惧地举起了反叛的旗帜，本能的爱让她冲破传统道德控制下的不安与羞耻，勇敢地向克莱尔坦白自己的过去。苔丝的伦理选择始终未曾背离这片纯良的土地所教给她的原则，就如同和谐而有力的乐曲一般。自然与爱人的音乐给予苔丝勇气来做出自己的伦理选择。她不愿意沉沦为男性的玩物与附庸，宁愿身死也要捍卫自己对纯洁爱情的向往。“哈代正是一位对声音特别敏感的作家，音乐在他的创作中，如同浪漫主义作家笔下的自然意象一样，是与社会法则对立的、给人的心灵带来慰藉的美的源泉”（吴笛 45）。声音的律动象征着苔丝的生命冲动，推动苔丝做出属于自己的伦理选择。

历史跨越百年，时空回到中国，寻根文学时期的中国文坛，贾平凹敏感地认识到文学创作正向全新领域拓展，艺术是世界相通的，存异的只是民族气质决定下的不同表现罢了²。秦腔作为陕甘宁地区的民间传统艺术瑰宝，历史悠久，是当地人文化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中的老校长夏天智钟爱秦腔，经常用大喇叭公开播放，对自己的媳妇白雪——曾经的秦腔女演员也十分钟爱。书中反复出现秦腔唱段，都是人物有感而发，张口即唱。秦腔是清风街村民用来表达情感的手段，红白喜事家长里短，都少不了这一嗓子。然而随着夏中星的势利作为，白雪失业，秦腔剧团解散，这一民间艺术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棺木入墓室，帮忙的人砌了墓门，铲土壅实。一堆高高大大的坟隆起来了，乐班也驻了乐，但高音喇叭上仍在播放着秦腔曲牌《祭沙》”（415）。引生无法确定在夏天智落葬仪式上听到的秦腔乐声从何而来——是喇叭里还是天上？天上是不可能传来乐声的，但读者随即会意识到，今后的喇叭里也不会再有秦腔。大家只沉浸在夏天智去世的悲伤中，除了引生，再也没有人意识到这是秦腔最后的绝唱。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6.

2 参见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第十八卷》，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0页。

秦腔作为隐喻的艺术符号，诞生于传统农耕，用以表现乡土生活，是群体的共有艺术，是融在乡民血液中记忆里的根，也即是伦理本身。夏天智和白雪身体力行挽救秦腔的生存传承，是他们出于对乡土的挽留而做出的伦理选择。秦腔的衰落给夏天智、白雪乃至给作者贾平凹本人以及任何一位读者的心头敲响了一记警钟。文明更迭中传统艺术生存空间的锐减威胁着民族艺术的传承。这不是独属于夏天智与白雪的伦理选择，这是每一个面对新旧文化传统冲突的现代人所面临的伦理选择。

两部小说借音乐这一艺术形式揭示了鲜明的伦理矛盾，展示了具有代表特质的伦理选择。《苔丝》中的音乐始于自然，又融合进苔丝一生的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中，《秦腔》中则以秦腔的凋零来表现民间艺术悲凉的处境与维护伦理道德的诉求。音乐超越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具有超越立场的审美功能，因而可以作为创作的叙事方法来表现文学世界。音乐淡去，曾经嘹亮的乡土话语逐渐沉默，伦理选择陷入无奈的困顿，最终消解在时间的浪潮里。小说中的人物正以自己的命运谱写抑扬顿挫的乐章，读者也在音乐中完成对伦理困境的认知，以接收端角度完成对艺术与文明发展历程的体验。

结语

《苔丝》和《秦腔》都对在各自背景下对现代文明冲击下的乡村生活与乡土文明进行了深层观照和检视。文学的产生源于人类伦理表达的需要，它从人类伦理观念的文本转换而来，其动力来源于人类共享道德经验的渴望。¹伦理的发生本质上是人的思想与道德活动的体现。作为以现实为素材的小说，两部作品都把人类个体置于广阔的伦理环境与多维的伦理关系网中，充分显出世界的矛盾性与多样性。面对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小说人物选择自己的伦理身份，由伦理选择指引走向自己的结局。作者们的书写同样是作者们的伦理选择，他们正站在万象更替的时代边沿叩问、找寻前路的大门，并将这无解的谜题交到读者手中，在接收端再一次完成对文本的伦理选择与审美认知。

正如哈代在《小说与诗歌集总序》中写道，虽然表面看来，这些人的思想感情都带有地方色彩，而实际上却四海皆然。²哈代与贾平凹所处的时代背景、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失落的乡土业已成为共通的隐性伤痛，呼唤着伦理道德的回归。因此，两部小说在艺术审美与伦理思想拥有高度耦合的创作前提，作品反映出各方面伦理选择问题也惊人相似。中西方文化拥有共同艺术规律与共性价值追求，源于人类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对道德审美的笃信和对文明传承的努力，这就是不同时代的文学所能达成的共鸣，是人类共情能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90.

2 参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译丛》委：《文学理论译丛·三》，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第291页。

力的依托，是不同语言文化背景下的人们之所以能够进行对话交流和文明互鉴的基础所在。

Works Cited

丁世忠：《哈代小说伦理思想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

[Ding Shizhong. *Ethical Thoughts of Hardy's Novels*. Chengdu: Sichuan Bashu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2008.]

Gindin, James. *Harvest of a Quiet Eye*. Bloomington: Indiana UP, 1971.

托马斯·哈代：《苔丝》，孙法理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

[Hardy, Thomas.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translated by Sun Fali. Nanjing: Yilin Press, 2001.]

——：“小说与诗歌集总序”，《文学理论译丛·三》，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译丛》委。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289-296。

[—.“General Preface to the Novels and Poems.” *Translation Series of Literary Theory*.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5. 289-296.]

Houlston, Jackson. “Thomas Hardy's Use of Traditional Song.”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44 (1989): 301-334.

贾平凹：《贾平凹文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Jia Pingwa. *Collected Works of Jia Pingwa*. Xi'an: Shanxi Renmin Publishing House, 1998.]

——：《平凹四书：秦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Qin Qia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3.]

李定清：“文学伦理学批评与人文精神建构”，《外国文学研究》1（2006）：44-52。

[Li Dingqing.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istic Spirit.”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1 (2006): 44-52.]

Michael, Millgate. *Thomas Hardy: Selected Letters*. Oxford: Oxford UP, 1990.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概念的阐释与考辨”，《外国文学研究》6（2015）：10-19。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The Exposition and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Definition of Human Nature.” *Foreign Literature Studies* 6 (2015): 10-19.]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Radford, Andrew. *Thomas Hardy and the Survivals of Time*. Aldershot: Ashgate, 2003.

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天津：天津社科院出版社，2007年。

[Taine, H. *Lectures of Art*, translated by Fu Lei. Tianjin: 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7.]

Tylor, Edward. *Primitive Culture: Researche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Mythology, Philosophy, Religion,*

Language, Art, and Custom. London: John Murray, 1871.

吴笛：“文学与音乐的奇妙结合——论哈代文学作品中的音乐性”，《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2001）：39-45。

[Wu Di. “A Skillful Combination of Literature and Music—A Study of the Musicalness of Thomas Hardy’s Literary Works.”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1 (2001): 39-45.]

吴为娜：《论哈代小说的乡土色彩和民俗因素》，2006年。南京师范大学，博士论文。

[Wu Weina. “*On The Country Color And Folklore of Thomas Hardy’s Novels.*” 2006.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Ph. D. Dissertation.]

许子东：“寻根文学中的贾平凹和阿城”，《文艺争鸣》11（2014）：9-14。

[Xu Zidong. “Jia Pingwa and A Cheng in Root-Searching Literature.” *Contention In Literature And Art* 11 (2014): 9-14.]